



Diversity and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classifier system of Xianghua, Northwestern Hunan

Hilary Chappell

► To cite this version:

Hilary Chappell. Diversity and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classifier system of Xianghua, Northwestern Hunan. *Lishi Yuyanxue Yanjiu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014, 8, pp.229-238. hal-03929373

HAL Id: hal-03929373

<https://hal.science/hal-03929373>

Submitted on 6 Feb 2023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多样性與歷史演變：以鄉話(湘西)的名量詞系統為例¹

曹茜蕾 Hilary Chappell

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 EHESS · Paris

摘要：

本文主要考察湖南西北部湘西地區未分類語言鄉話中三個高頻量詞 pa^{41} , lau^{13} 和 $tiau^{13}$ 的用法及其來源。文章旨在試圖推斷與普通話“個”相對應的通用量詞 pa^{41} 的來源。同時還指出 lau^{13} 和 $tiau^{13}$ 的同源詞是“條”。這兩個量詞體現了鄉話的不同歷史層次。而 $tiau^{13}$ 很可能是從當地通用語西南官話中借入的。就漢語量詞系統而言，本文採用貝羅貝 Peyraube (1998a, 1998b)，尤其是 Peyraube & Wiebusch (1993)，(同樣在貝羅貝、林徽玲 (2010), Lin & Peyraube (2012) 中) 提出的假設，認為漢語量詞系統的衍生經歷了由通用到專用之後再回到通用，由量化到分類和量化再到純粹量化的循環演變 (cyclic change) 過程。

關鍵詞：鄉話，西南官話，通用量詞，專用量詞，量化，分類，循環演變，語言接觸

English keywords: Xianghua, Southwestern Mandarin, general classifiers, specific classifiers, quant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cyclic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¹本研究成果承蒙“歐盟第七框架計劃(FP7/2007-2013)下之歐洲研究理事會 (ERC)撥款資助 (ERC 基金批准號 230388，資助課題：漢語方言混合語法的類型比較 ‘The hybrid syntactic typology of Sinitic languages (SINOTYPE)’)，謹此致謝。

本文初稿曾在第五屆漢語方言語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 年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29 日，上海大學) 上，也在星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2011 年 1 月 25 日)宣讀，本人謹此感謝薛才得, K.K. Luke (陸鏡光), Bee Chin NG (黃美真), Laurent Sagart (沙加爾),以及 SINOTYPE 項目組的成員們：陳玉潔，陳偉蓉，Hilario de Sousa (蘇沙)，李旭平，呂珊珊，倪星星，宋娜，王健所給予的意見以及宋娜的中文翻譯，還特別感謝鄉話調查的發言人們。

1. 引言：量詞系統的演變

在漢語族語言中，量詞 (CL) 是在句法位置上前置於名詞 (N) 的一類詞，主要與名詞、數詞 (NUM) 或數量詞 (Q) 合用：Num/Q - *(CL) - Noun. 根據個別漢語方言的特點，量詞也可以和指示詞 (DEM) 合用：DEM - (CL) - Noun. 首先舉兩個湘西鄉話的例子，第一個是「數-量-(形)-名」結構，第二個是指示詞和量詞合用的情況。

- (1) ɕi³³ pa⁴¹ poŋ²⁵tsi la⁵⁵, pa⁴¹ tsɿ²⁵ ŋ²⁵, pa⁴¹ sɿŋ⁵⁵ tiəu³³ la⁵⁵
 四 □_{CL} 椅子 語氣詞 八 隻_{CL} 碗 , 八 隻_{CL} 箸 啦
- fɑ²⁵pai¹³ la⁵⁵, ai⁵⁵ sa⁵⁵ n̩iaŋ¹³ tau⁵⁵ɕi⁵⁵ /pi¹³ ɕy⁵⁵/西南官話 iau³³ tɿ³³ ti.
 火 盆 啦, 這 些_{CL} 小 東 西 必須 要 得 的

« 四張板凳啦、八隻碗、八雙筷子啦、(還有)火盆啦，這些小東西都是必須要送的。 »
 (2008, 古丈縣城：《婚禮》)

- (2) «nɿn²⁵» ai⁵⁵ pa⁴¹ dza³³ mi⁴¹tɕi²⁵ ɕyo²⁵?
 難 這 □_{CL} 字 怎麼 寫

“難”這個字怎麼寫？

這裡我們所說的名量詞只限於個體量詞，按照這個定義，單位詞或計量詞將不記作為名量詞，如：三斤羊肉 “three pounds of mutton” 或 一瓶米酒 “one bottle of rice wine”. 集合量詞也不記作名量詞，如：那群蝴蝶 “the swarm of butterflies”。因為單位詞，計量詞和集合量詞也存在於其他沒有真正量詞系統的語言裡（正如上例的英語翻譯），因此這些詞將不計入在內。（參見張欸 2012）。

依據 Peyraube & Wiebusch 1993 的理論，從歷時的角度觀察，漢語量詞系統有兩個重要

的演變。從詞匯多樣化上來說，經歷了從通用量詞（general classifiers）到專用量詞（specific classifiers）的演變。從語義分類功能上來說，量詞系統從起初的量化功能（quantifying function）逐漸發展出來分類功能（classifying function）。分類功能又導致專用量詞增多，因此量詞也逐漸達到多樣化的高峰。然而，從 13 世紀近代漢語開始，量詞系統卻朝著兩個相反的趨勢演變。開始出現詞匯的統一化（lexical unification），即由專用量詞到通用量詞。語義上的分類功能也消失了，即由分類功能到量化功能。因此，這兩個過程便造成了量詞系統的兩個循環性演變（cyclic change），即從通用量詞到專用量詞再回到通用量詞，以及從量化功能到量化與分類功能再回到純粹量化功能。

[+量化] > [+量化] > [+量化]

[-分類] > [+分類] > [-分類]

[-多樣化] > [+多樣化] > [-多樣化]

這兩個演變趨勢對量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個體量詞”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個體量詞最早出現的時代大約在西漢時期（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 9 年），到中古漢語前期（公元 3 到 6 世紀）開始出現多樣化（參見王力 1958, Yang-Drocourt 1993, 貝羅貝 Peyraube 1998b）。

中古漢語以前（Pre-Medieval Chinese）到中古漢語后期（Late Medieval Chinese, 7 世紀），量詞的主要功能只是量化，而沒有分類功能。也就是說，當時的量詞不能體現出對所修飾名詞的語義特徵（或者很少）。從中古漢語后期到現代漢語方言（19、20 世紀），量詞變得非常多樣化，並同時承擔了為名詞分類和量化的兩個重要角色（Chappell & Peyraube 2011, Yang-Drocourt 2004 : 157-166）。到了 20 世紀，在一些北方話當中量詞開始失去分類的功能，多樣化程度也隨之降低（參見 Peyraube & Wiebusch 1993）

2. 鄉話三個高頻量詞

我們的研究對象是湖南湘西未分類語言鄉話的量詞系統。² 鄉話量詞多樣化程度很高，常用的個體量詞有二十多個，量詞系統比較發達。這也証實了橋本萬太郎 (Hashimoto 1976) 的說法，即中國南方漢語方言的個體量詞比北方方言的多。(也見劉丹青 2002, Tai 1994)。根據我們目前的觀察，這些量詞除了有量化功能之外，還有分類功能。實際上，鄉話的量詞還處在量詞系統最典型的階段，亦即循環演變的中間發展階段。我們重點觀察三個高頻量詞，並探討這些量詞是否已經開始朝通用化的方向演變。

鄉話關於量詞的語料主要來自 2008 年，2010 年和 2012 年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縣 (古陽鎮) 以及高峰鄉的田野調查。除了少數民族語言外，西南官話是使用最廣泛的漢語方言 (伍雲姬，沈瑞卿 2010，曹志耘 2007)。

我們關注的鄉話量詞是 *pa*⁴¹□、*lau*¹³條 和 *tiau*¹³条³，前一個量詞的本字還不清楚。觀察重點是三個量詞的來源，分類功能和通用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鄉話中也使用普通話通用量詞“個”，主要用於針對人的量化功能，如親屬關係，職業等，也用於一些事件名詞，如婚禮，宴會和時間等。但是由於其語義上的限制，使用情況不多。

3. 量詞 *pa*⁴¹□ 以及其來源

第一個高頻量詞 *pa*⁴¹□ 的核心用法是形狀小而圓的東西。所以順理成章地成為水果或蔬菜之類的球形物品的量詞，其中包括鼻子，臉，眼珠，牙齒等小而圓的身體部位；小型物品、圓形物件，如籃子、罐子、盆兒、碗等。

表一列舉出一些在各個語義範疇具有代表性例子，依次小而圓的水果，豆類及蔬菜等外

²說鄉話的當地人把他們的方言稱作“鄉”，或者說 *kan*²⁵ *ein*⁵⁵ “講鄉話”。因為跟湘語的“湘”字同音，我們把當地方言稱為“鄉話”。

³ 我們採取繁體字的“條”來表示 *lau*¹³，用簡體字“条”來表示 *tiau*¹³。

表球形的物體。

*pa*⁴¹□ 的例子

表一：水果與蔬菜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i>lau</i> ¹³ 桃	桃子
<i>koŋ</i> ⁵⁵ <i>tʂa</i> 柑子	橙子
<i>dʒa</i> ²⁵ <i>tʂa</i> ⁵⁵ 李子	李子
<i>lo</i> ¹³ <i>ta</i> ³³ □豆	黃豆
<i>lu</i> ³³ <i>lo</i> ⁴¹ <i>tʂa</i> 大辣子	柿子椒
<i>kuɑ</i> ⁵⁵ 瓜	南瓜

與上表相對而言，長型的瓜類蔬菜則使用量詞 *lau*¹³，如 *sa*⁵⁵*kuɑ*⁵⁵ 絲瓜，*tʂia*²⁵*tsʰau*⁵⁵ 韭蔥和 *ŋ*¹³*kuɑ*³³ 黃瓜（見 §4）。

量詞 *pa*⁴¹□ 的用法也延伸到兒童或動物的幼崽，因此保留了[+小]的語義特徵。如表 2 所示：

表二：兒童語動物幼崽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i>ŋiəu</i> ²⁵ <i>tʂa</i> ⁵⁵ 女子	女孩兒
<i>tʂa</i> ¹³ <i>tʂa</i> ⁵⁵ 子子	男孩兒
<i>ŋiaŋ</i> ¹³ <i>kʰuai</i> ²⁵ 小*犬	狗的幼崽
<i>ŋiaŋ</i> ¹³ <i>mau</i> ⁵⁵ <i>zi</i> 小*貓子	貓的幼崽

量詞 *pa*⁴¹□ 的用法還延伸到小型動物和昆蟲，這仍然保留了[+小] 的特徵：

表三：小型動物與昆蟲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tsu ⁴¹ tsi 雀子	鳥（總稱）
tiəu ⁵⁵ tiəu ⁵⁵ tsa 蛛蛛子	蜘蛛
vu ¹³ mau ²⁵ □□	青蛙
mu ⁴¹ ti ³³ □□	蒼蠅和蚊子的總稱
pɿŋ ¹³ ko ¹³ 螃□	螃蟹

此外, pa⁴¹□還可以用於許多小型, 且具有圓形截面或圓形輪廓的制造器具, 如籃子, 罐子和盆, 如表四所示。而大型的重物及方形制造器具則使用量詞 tia¹³ (見 §5).

表四：圓形制造器具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pai ¹³ 盆	盆
phau ⁵⁵ tsaŋ ¹³ □□	簍*
pi ¹³ 罐*	罐子
poŋ ²⁵ tsi 板子	凳子
tiəu ⁵⁵ dzu ¹³ 豬□	豬籠

常見小或圓的身體部位, 仍然使用量詞 pa⁴¹□。長型的則使用量詞 lau¹³, 如 ku⁴¹腳 (腿) 和 lau²⁵mau⁵⁵ 腦毛(頭髮).

表五：小或圓的身體部位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pi ⁵⁵ kaŋ ⁵⁵ 鼻□	鼻子
lau ²⁵ ku ²⁵ 腦殼*	頭
ŋai ²⁵ tɕiəu ⁵⁵ 眼珠	眼睛
dzɿ ¹³ ta 舌頭	舌頭
ŋo ⁵⁵ ts ^h i ⁵⁵ 牙齒	牙齒

除了這些語義范疇以外，我們發現在錄音談話資料的很多例句中，量詞 pa⁴¹□也可以作為通用量詞修飾一個泛指的概念。正如下文的語料摘錄所示，在專用量詞 tia¹³引出話題名詞 *kha*¹³-xŋ³³(地方) 之後，該名詞第二次出現時，則使用 pa⁴¹□。在對話的最後一句中，發言人轉用西南官話提問，然而仍然使用通用量詞 *kəu*³³ 個。這與上一句的 pa⁴¹□的通用用法相呼應，也說明了 pa⁴¹□的語義範圍在逐漸地擴大（參見 Erbaugh & Yang 2006）。

(3) sau³³ tau³³ uo¹³ tia¹³ kha¹³-xŋ³³
送 到 哪 条_{CL} 地方

oŋ²⁵ pa⁴¹ kha¹³-xŋ³³ la⁵⁵
那 □_{CL} 地方 啦,

ai⁵⁵ kəu³³ /li²⁵ pu li²⁵/西南官話

这 個_{CL} 利 不 利? (2010, 古丈縣城: « 葬禮 »)

在這些收集的數據和語料中，我們還發現了許多例子，其中 pa⁴¹□並非用作專用量詞，而是如同普通話的“個”一樣，用作通用量詞。量詞 pa⁴¹□擴大化的例子如下：ko⁵⁵tsa 夾

子 (鉗子), tau⁵⁵ 刀, tan⁵⁵dz¹³ 口池 (天井), thia²⁵ 柱, sa⁵⁵ 篩和衣服等。其中都沒有形狀上 (圓形) 的顯著要求。因為這些名詞都有自己的專用量詞, 這就又一次証明了量詞 pa⁴¹ 口的小而圓語義特徵開始脫落, 已經向通用量詞的方向發展。以上的例子中的專用量詞為: i¹³po²⁵ ko⁵⁵tsa 一把夾子; i¹³po²⁵tau⁵⁵ 一把刀; i¹³tiau¹³tan⁵⁵dz¹³ 一條口池; i¹³lau¹³thia²⁵ 一條柱; i¹³k^hua³³sa⁵⁵ 一塊篩 和 i¹³tɕ^hia^{25,55}i 一件衣。

一般來說, 時間和地點名詞使用量詞 kəu³³ 個 (例 3), 野生動物名詞使用量詞 tiau¹³ (見 §5)。而且, 當不使用這些專用量詞的時候, 量詞 pa⁴¹ 口還可以默認地替代這些專用量詞, 如: i¹³pa⁴¹p^hau¹³k^hu²⁵ 一口_{CL}豹口; i¹³pa⁴¹sa⁵⁵ti 一口_{CL}獅口。

3.1 量詞 pa⁴¹ 的來源

張頡 (2012: 95-121) 指出了量詞體系中一種很重要的類別, 即形狀分類詞 (shape classifiers)。漢語形狀分類詞漢代就有, 但是使用頻率不高。魏晉南北朝就開始變得發達, 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熟。其中主要包括圓形, 長形, 面形和塊狀這四種。圓形的量詞有四個: “丸”、“顆”、“粒”與“團” (2012: 95-97)。

很顯然, 量詞 pa⁴¹ 屬於圓形的一類, 但是其來源至今還不清楚。這是否和附近的沅陵鄉話或是湘西西南官話有關係呢? 附近的沅陵鄉話也有類似的量詞 pa⁵³, 但是 pa⁵³ 有“一粒”或“一顆”的用法, 比如: 一 pa⁵³口米, 一 pa⁵³口老鼠。它的使用範圍並不廣泛 (參見楊蔚 1999: 173, 214)。湘西西南官話中 (常德和吉首方言具有代表性), 易亞新 (2007: 140-150) 描述了常德方言中的量詞, 認為量詞“個”的使用最為普遍, 並且也觀察到量詞通用化的趨勢, 即“個”已經開始取代許多專用量詞。常德方言的狀況顯然與鄉話不同。此外, 也沒有發音或語義特征類似於 pa⁴¹ 口的量詞。另外, 吉首方言也沒有同 pa⁴¹ 口類似的量詞 (參見李啟群 2002: 212-217)。

3.2 量詞 pa^{41} 和苗語、土家語

楊再彪 (2004: 313-317) 描寫了湘西六種苗語所有量詞的用法。在他所列的 540 個量詞中，只有兩個類似 pa^{41} 的發音。其中一個是吉首丹青苗語的 pa^{11} （有“一捆柴”的“捆”的用法）；另一個是 pa^{33} （有“一束花”的“束”的用法）。這兩個量詞類似普通話的“把”的用法，有可能是借詞。不過鄉話也有“把”這個量詞 po^{25} 把，用於有柄的工具，跟普通話類似。所以， pa^{41} 的來源目前還是不清楚。

我們目前尚未考察另外一個少數民族語言，土家語的情況。土家族位於湘西古丈縣的西北邊（永順、保靖、龍山、槽植），土家語屬於藏緬語系。根據陳康對其量詞的描述 (2006:67)，有一個量詞 pu^{55} ，相當於普通話中的“粒”、“個”、“塊”的用法，可以“用於呈圓形、團狀、顆粒物體”。該量詞可以修飾以下名詞，例如米、梨、雞蛋、石頭和茄子。鄧佑玲 (2002: 128) 對 pu^{55} 也有同樣的解釋。羅安源等 (2001: 72, 207) 在對永順土家話的描寫中，也把 $pu^{24} \sim pu^{51}$ 作為人、水果與地點名詞的通用量詞。鄉話與土家語這兩種語言的通用量詞的語義內容十分類似，聲母相同，只有韻母聲調不同。

張楨 (2012: 121) 對這樣的量詞的來源解釋如下：“由植物部位名詞發展為規則形狀量詞是分類詞語言中有共性的演變，西南亞語、泰語、孟高棉語、卡勐語（Kam-Muang）、米南卡保語等語言中表示圓形物的量詞都是從表示果實、谷粒、種子這樣意思的名詞而來”。鄉話也不例外， pa^{41} 的可能來源由一種表示種子或谷粒的外來借詞。然而，鄉話的語言接觸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4. 量詞 lau^{13} 條以及其來源

第二個量詞 lau^{13} 條 的語義範圍涵蓋了普通話專用量詞裡的“條”、“根”和“枝”。也就是說，無論是柔軟的，還是有硬度類似棍子之類長條形狀的物體都可以使用。因此，一些製造物、衣服、動物、蔬菜等，只要具備以上所提到的語義特徵，就能使用 lau^{13} 。例如：

表六：lau¹³ 條的例子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k ^h u ²⁵ ku ⁵⁵ 苦瓜	苦瓜
ɲɿ ¹³ ku ³³ 黃瓜	黃瓜
fi ²⁵ 虺	蛇
zuai ²⁵ 蚓	蚯蚓
kuai ⁵⁵ 褲	褲子
p ^h o ⁵⁵ 帕	頭巾
lin ¹³ tʂa ³³ 腸子	腸子
lau ²⁵ mau ⁵⁵ 腦毛	頭髮
tʂa ²⁵ yɛ ⁵⁵ 紙烟	烟
su ⁴¹ 索	繩子
ɣau ¹³ kɲɿ ³³ □杆	竹竿

楊蔚 (1999: 172-3; 185) 對沅陵鄉話進行了細致的描述。雖然沅陵離古丈縣只有六、七十公裡左右，但不是同一種方言。兩個方言的量詞系統不同。沅陵鄉話的通用量詞 *laɔ*¹³，相當於普通話的“個”，使用的範圍很廣，可以用於人、動物、地點，機器和工具名詞（楊蔚 1999: 172-3; 185）。如：

- (4) i¹³ laɔ¹³ ŋ⁵⁵ 一條人
- i¹³ laɔ¹³ mɛ⁵⁵tʂa⁵³ 一條蚊子
- i¹³ laɔ¹³ dziaɔ¹³ 一條橋

虽然沅陵鄉話 $la\sigma^{13}$ 的用法跟古丈鄉話的 lau^{13} 涵盖语义范围有部分重叠，但是沅陵的用法更广泛。

量詞 lau^{13} 的本字很可能是“條”。一般來說，古丈鄉話的 [l] 聲母來源自中古漢語的部分定母字和澄母字(伍雲姬，沈瑞卿 2010: 15, 24) 例如：鄉話“桃 lau^{13} ”對應普通話的 $[t^hau^{35}]$ ；大 lu^{33} 對應普通話的 $[ta^{51}]$ ，“糖 $lv\eta^{13} \sim [t'au\eta^{35}]$ ”，“蟲 $liau^{13} \sim [t\varsigma'o\eta^{35}]$ ”等。

5. 量詞 $tiau^{13}$ 条以及其来源

鄉話的量詞 $tiau^{13}$ 条 與普通話的 t^hiau^{35} 條 同源，但是用法完全不同： $tiau^{13}$ 大量使用在大型、沉重、長方形的制造物和建筑上，而不像普通話那樣修飾細長的物品。例如：大木桶、箱子、大背簍，大型家畜或野生動物，一長排的房屋或高樓。

表七： $tiau^{13}$ 条的例子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k^h uai^{33} dzv\eta^{13}$ 晒床	床
$zo\eta^{13}$ □	用於背炭、桐油籽等的大背簍
$fu^{13} t^h au^{55}$ 庠桶	脫谷粒時用的正方形的大木桶
$di^{13} t^h au^{55}$ 提桶	有一個柄，用來舀豬食的小木桶
$tiau^{33} ku^{41} la^{55}$ 吊腳樓	吊腳樓
$ts^h o^{55}$ 車	車
$k^h uai^{25} u^{55}$ 犬窩	狗窩
$p^h au^{13} k^h u^{25}$ 豹□	豹虎
$kau^{55} mo^{25}$ 公馬	公馬

5.1 量詞 *tiau*¹³ 條的貶義用法

當量詞 *tiau*¹³ 條 指人時，一般表示貶義。如：

- (5) *i*¹³ *tiau*¹³ *ts*^h*ʔ*⁵⁵*ta* 一條賊頭 (一個小偷)
 *i*¹³ *tiau*¹³ *tsau*⁵⁵*ti* 一條聾*□ (一個聾子)

一般來說，用 “*i*¹³ *tiau*¹³ *sa*⁵⁵*fu*⁵⁵ 一條師傅” 不如用 “*i*¹³ *kəu*³³ *sa*⁵⁵*fu*⁵⁵ 一個師傅” (一個老師) 顯得禮貌，前者表示貶義。“*ŋi*¹³ *oŋ*²⁵ *tiau*¹³ ! 你那條! 也是罵人的話。

也就是說，鄉話的量詞 *tiau*¹³ 條 與普通話的 *t^hiau*²⁴ 條 雖然是同源詞，可是在分類的功能有很大的區別。

5.2 量詞 *tiau*¹³ 條 的來源

如果普通話 *t^hiau*²⁴ 和 鄉話 *lau*¹³ 存在對應關係的話，那麼為什麼在古丈鄉話還多出一個 *tiau*¹³ 條 字？*tiau*¹³ 多半用在大而重的東西上。我們認為，這個量詞很可能是一個從西南官話借來的，而且是比較新的量詞。湘西是雙方言區，在鄉話中這兩個量詞很可能同源：*lau*¹³ 條, *tiau*¹³ 條，二字韻母相同，且同屬陽平調類（聲母對應關係，見§4）。然而，*tiau*¹³ 條 和 *lau*¹³ 條 在古丈鄉話表現出語義上的分工，所以，到目前為止，*tiau*¹³ 條 沒能替代 *lau*¹³ 條。同沅陵鄉話的通用量詞 *laʊ*¹³ 相比，即使古丈鄉話 *lau*¹³ 的使用範圍更有限制，其對細長物體分類功能也還是比較明顯。*lau*¹³ 更像是普通話量詞 *t^hiau*²⁴ 條 的用法。

李啟群 (2002: 285) 認為吉首西南官話中的量詞“條” 最為普遍，而且“條” 讀 *dau*¹¹ 或者 *diau*¹¹ (陽平)。此外，*dau*¹¹ 的使用範圍很廣，可以修飾人，身體部位，動物，植物，工具，服飾的名詞等。吉首市是湘西自治州的首府，而古丈縣離吉首市只有 45 公裡。我們

可以推斷吉首方言有可能是鄉話 $tiau^{13}$ 的來源。然而，古丈縣的西南官話也有同樣現象。伍和沈（2010：6）也描述了古丈西南官話的聲調系統。陽平調值為 13。以此看來， $tiau^{13}$ 來源於古丈縣西南官話的 $tiau^{13}$ 的可能性更大。不過為了確認這樣的假設，還要考察 $tiau^{13}$ 在古丈西南官話的語義範疇及其用法，判斷是不是主要修飾大而重的物體。

四 结论

總而言之，我們在引言中談到量詞系統演變的最后一個階段，即從專用量詞到通用量詞的規律。鄉話的量詞 pa^{41} 大量地使用在各類詞匯範疇，其原本“小而圓”的性質特徵正被逐漸淡化，處在正在向通用化方向演變的階段。但是整個量詞系統顯然沒有達到純粹量化以及詞匯統一化 (lexical unification) 的程度。即便是使用最普遍的量詞 pa^{41} ，核心功能是用來修飾小而圓的物品，或者至少有一個凸出的球形或圓形部分的物品，也還沒有完全失去語義上的分類功能。在這個基礎上， pa^{41} 的用法延伸到不具有這些特徵的物品，如 $p^hau^{13}k^hu^{25}$ 豹虎（一種虎） $sa^{55}ti$ 獅（獅子）和 $v\gamma^{13}$ （熊）。

鄉話的兩個同源量詞 $tiau^{13}$ 條 跟 lau^{13} 條 出現了語言競爭的現象。除非它們語義上的分工繼續，否則，更新層次的借詞 $tiau^{13}$ 條 在西南官話強力的影響下經過語義擴大化 (generalization) 可能會逐漸取代屬於舊層次的 lau^{13} 條。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還只是個推測。

量詞的分類功能在鄉話中仍然很明顯。這和一些北方方言顯然不同，也印証了 Hashimoto 橋本萬太郎 (1976) 的說法。某些西北方言幾乎都只用量詞“個”，例如：蘭州話 (黃伯榮 1996：150)，東干話 (Dungan Chinese) (Hashimoto 1976)，以及中原官話關中話 (陳玉潔 2007：6)。

古丈鄉話和沅陵鄉話在量詞系統上有十分明顯的差異。為了更加確實地了解漢語族語言

個體量詞的特徵及其歷史演變規律，我們還需要大量地、持續地進行對於中國方言的研究調查工作。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7 ‘湘西方言概述’ 《語文研究》 1: 42-47.

Chappell, Hilary & Alain Peyraube. 2011. Grammaticalization in Sinitic languages. Chapter 65.

In Bernd Heine & Heiko Narrog (eds.) *A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86-796.

陳康 2006 《土家語研究》。北京：中央人民大學出版社。

陳玉潔 2007 ‘量名結構與量詞的定語標記作用’ 《中國語文》 6: 516-530.

鄧佑玲 2001 ‘土家語名量詞研究’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 5: 128-131.

Erbaugh, Mary & Bei Yang. 2006. Two general classifiers in the Shanghai Wu dialect : a comparison wit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35.2 : 169-2007.

Hashimoto, Mantaro (桥本万太郎). 1976. Language diffu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Problems of typological diversity in Sino-Tibeta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3: 49-65.

黃伯榮 1996 《漢語方言語法類編》 青島出版社。

Lin Jang-Lin & Peyraube, Alain. (2012). Individuating Classifiers in Early Southern Min (14th -19th centuries). In: Xu Dan (ed.), *Plurality and classifiers across languages in China*.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pp.101-118.

劉丹青 2002 ‘漢語類指成分的語義屬性和句法屬性.’ 《中國語文》 5: 411-422.

羅安源、田心桃、田荊貴、廖喬靖 2001 《土家人土家語》 北京：民族出版社

- Peyraube, Alain. 1998a. 'On the history of classifiers in Archaic and Medieval Chinese.' B. T'sou, ed., *Studia Linguistica Serica*.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1-145.
- Peyraube, Alain. 1998b 貝羅貝. '上古, 中古漢語量詞的歷史發展.' « 語言學論叢 » 21: 99-122.
- Peyraube, Alain & Thekla Wiebusch. 1993. 'Le rôle des classificateurs nominaux en chinois et leur évolution historique : un cas de changement cyclique.' *Faits de langue* 2.51-61.
- Peyraube, Alain 貝羅貝 & Lin Jang-Lin 林徵玲 2010 《老乞大》的個體量詞和語言循環現象之關係。《漢語史學報》2: 1-9.
- Tai, James H-Y. 1994.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and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Matthew Chen & Ovid Tzeng (eds.)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Taiwan : Pyramid Press.
- 王力 1958.《漢語史稿》 北京：科學出版社.
- 伍雲姬, 沈瑞卿 2010.《湘西古丈瓦鄉話調查報告》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楊蔚 1999 《沅陵鄉話研究》 望城：湖南教育出版社.
- 楊再彪 2004《苗語東部方言土語比較》 北京：民族出版社.
- Yang-Drocourt, Zhitang. 1993. 'Analyse syntaxique des expressions quantitatives en chinois archaïqu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2.2: 217-237.
- Yang-Drocourt, Zhitang. 2004. *Evolution syntaxique du classificateur en chinois du XIIIe siècle avant J.-C. au XVIIe siècle*.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7). Paris : CRLAO, EHESS.
- 易亞新 2007 《常德方言語法研究》 北京：學苑出版社.
- 張 赓. 2012.《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English abstract: Diversity and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classifier system of Xianghua, Northwestern Hun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s and use of the three principal high frequency classifiers used in Xianghua, an unclassified Sinitic language spoken in Xiangxi, Northwestern Hunan. These are /pa⁴¹/, /lau¹³/ and /tiau¹³/. The aim is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origin of the general classifier /pa⁴¹/ which corresponds to *gè* « 个 » in Standard Mandarin. While it is shown that /lau¹³/ and /tiau¹³/ 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source in 條, they represent different layers in the Xianghua language, /tiau¹³/ being a relatively recent borrowing from Southwestern Mandarin, the *lingua franca* of this region.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carried out by Alain Peyraube (1998a, 1998b), and in particular the hypothesis by Peyraube & Wiebusch (1993), similarly taken up in Peyraube & Lin (2010) and Lin & Peyraube (2012), which claims that the creation of classifier systems involves a cyclic process beginning with a general use, then proceeding to specific uses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increase in number of individuating classifiers, and then finally reverting back to general uses, resulting from simplification of the system.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n initial quantification function, reinforced by an added classifying function, which similarly goes full circle to return to that of quantification.
